

俞辛焯

著作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俞辛焯著

朝政府を打倒する

計画を決めた

朝政府を打倒する

計画を決めた

朝政府を打倒する

計画を決めた

朝政府を打倒する

計画を決めた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この新隆起を

招きよめる

俞辛焞著作集

第九卷

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俞辛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前 言

辛亥革命是推翻封建清王朝建立共和制民国的革命，也是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革命。关于这一革命，中国出版了各种研究书籍、资料集、回忆录等，作了相当高水平的学术性研究；日本也有研究这一革命的论文集、新书等出版。但这些研究，主要是有关辛亥革命的内部结构和从政治、思想等视角开展研究的著作。然而从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的视角来看，在辛亥革命的研究方面，迄今虽有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论文或书籍问世，但是专门从事系统的集中研究的书籍尚付阙如。因此，本书从中日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视角，以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史作为对象展开研究。

所谓辛亥革命，是指将 1911 年 10 月爆发的武昌起义的革命作为一项历史事件，学术界的一般通说是将武昌起义至 1913 年二次革命称为辛亥革命。但是，类似此种历史事件，其爆发的历史背景与事件本身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无疑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一较长时期可以称之为辛亥革命时期。这样，辛亥革命与辛亥革命时期虽然有其共同点，但在时期划分上则存在时间差。从政治史而言，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至 1913 年暂告终结，但从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来看，由二次革命引发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并未结束。辛亥革命时的各种问题，持续到 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去，作为辛亥革命时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继

续，形成了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以袁的死去而告终结。本书以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义到 1916 年夏袁猝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时期为辛亥革命时期，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进行论述。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王朝政治开始向共和政治转化的时期，是帝制与共和制对立斗争高涨的过渡时期，也是反动的帝制暂时复辟的复杂时期。围绕中国这一时期的政体问题，形成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的焦点。本书将这一政体问题列为研究对象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政体问题是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并与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国家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日本支持君主立宪制，欧美列强则同情共和制，但是他们为了追求殖民利益超越了这一政治思想意识，日本援助主张共和制的孙中山，欧美列强则支持帝制或主张君主立宪制的袁世凯。这表明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为维护 and 扩大在华利益的争夺。

改变政体，会由于旧秩序崩溃，招致社会一时的动乱，有可能威胁日本和列强在华既得权益，但同时也给日本和列强提供了利用动乱以各种手段扩大新权益的机会，因此，日本和欧美列强有可能使用武力。孙中山等革命势力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重新承认与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保证列强的既得权益，以利于打倒自己的政敌，建立或恢复共和制，但这未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可以说这是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从当时国内外力量关系来看，也可以说是在革命的对内对外两个课题不能同时并举的情况下，采取的二者择一战略。

日本和欧美列强间关于政体问题的抗衡，是围绕控制企图掌握中国中央政权或是已经掌握政权的人物而展开的。日本和欧美列强，根据这一人物与自己国家的关系如何或是这一人物主张哪一种政体，由此来决定他们支持何方。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欧美列强无法按照这一原则采取行动，不得不绥靖日本对袁的帝制政策。

这一时期的政体变革，由清朝的帝制转变为共和、再由共和转变为袁的独裁，复由袁的独裁转变为袁的帝制。这一转变如伴随使用暴力，则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设若社会秩序紊乱，列强对中国的贸易，首先将直接受到损失。因此，列强在转变和稳定二者之间选择时，一般情况下是期望稳定的。因此日本和欧美列强对于对立的两种势力，采取折中调和或是支持一方，以使政局稳定。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欧美列强期望维持现状和稳定，日本则与此相反，意在利用社会秩序的动乱，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不过，在二次革命时，又并非如此。

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以政体为焦点的南北分裂时期。由于爆发辛亥革命，产生了清朝同包括南方立宪派在内的革命势力的尖锐对立，如 1913 年由于爆发二次革命，袁世凯一派同孙中山革命党的对立，1915 年底由于爆发护国运动，袁的帝制同孙中山等革命党和西南各省的反帝制、反袁势力的对立。这期间仅有一年左右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对立和分裂的时期。这可以视为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历史现象。这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复杂化，因而这一时期，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对华外交，可以说是对袁和对孙的外交。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个人物，是鲜明的不同的存在，基于两者的对立、妥协和斗争，出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局的展开和变动。但这不纯属中国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带有国际性的问题。袁、孙对日、对欧美列强的态度和外交政策，同日本和欧美列强对袁、孙的外交政策是相互对立的。这四者间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以双重外交关系而展开的，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因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袁和对孙的关系，用计量学的方法表现时，两者适成反比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日本的对袁政策成为其对中国政策的主体，根据对袁政策的如何来决定对孙的政策。从这一意义而言，日本的对孙政策从属于对袁政策，是派生性的，可以说去掉对袁政策，就不会有真正的对孙政策。本书以孙中山和袁世凯作为两个支柱，将日本的对袁、对孙政策和袁、孙的对日态度两者同时进行对照比较，以探讨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可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以对孙、对袁借款和其满蒙政策为中心，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推进对华外交，但无显著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日本大力推进对华外交的机会，极大地改变了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过去掌握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英国等欧美列强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不得不将这一主导权暂时让给了日本。日本乘机大幅度转换了其对华外交。日本借对德开战，占据了胶州湾和山东铁路（即胶济铁路），以此军事占领为后盾，掌握了对华政策的主导权，积极地展开了辛亥革命以及日俄战争后一直停顿的对华外交，向中国强提“二十一条”要求，将日本侵略中国的障碍袁世凯予以打倒、排除。经过拥戴黎元洪并使之与北洋军阀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合流，将北京中央政权控制于日本手中，为在中国取得最大权益铺平道路。这是一战期间日本对华外交所掠得的猎物。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不单纯是中日两国间的外交，而是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因此，本书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纳入与欧美列强的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

外交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是与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不可分的，亦即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各集团的利益为中心展开的，故而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和与此相关联的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是列强维持既得权益和扩大新权益的问题。有时以维持既得权益

为主，有时又以扩大新权益为主。欧美列强重视维持既得权益，与此相反，日本则积极追求扩大新权益。对于此种状态的中日外交和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关系，本书以实证性研究方法，将中国、日本、欧美列强这三者的三角外交关系归纳概括为双重外交论，并以此双重外交论对这一时期三者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简言之，本书的理论体系是双重外交论。

所谓双重外交论，系指日本和欧美列强为维护在华既得权益，采取协同一致的外交政策；而对于扩大新权益，则采取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双重关系。中国和列强虽然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但由于日本和欧美列强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争夺中产生矛盾和对立，中国则有时利用欧美列强抵制日本，有时又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反之，日本有时乘中国与欧美列强之间对立激化的机会，利用中国牵制欧美列强；欧美列强也乘中国与日本对立激化之机，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围绕侵华，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协调和争夺，是出于两者侵略本质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就是在这种双重外交的框架内进行的。

历史是在连续不断地变化中流逝的。今天的中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的继续，是痛苦不幸关系的历史产物。从这一意义考虑，拙著若能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为今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学术交流有所裨益，则殊为幸甚。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的研究，由于史料不足等原因，尚有诸多不明之处。在本书中，对此有的未予接触，也有未能进行充分叙述和分析之处。尤以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以及中国对日外交的内容及其政策决定过程等不明之处颇多。此外，由于中日外交是相互间的外交，在叙述中虽力求互相平衡，但因中国方面资料的不足，未能达到理想的均衡，对此不得不有待于新资料的发掘。

对于不断流逝的历史在学术上的认识和阐释是无限的，犹如接力赛跑之传递接力棒，接棒的运动员，在接棒前要向前先跑一步，虽未到终点，但若先跑一步，对于学术研究仍不无价值。本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业已到达了终点，而只是作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把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运动员，为此而将拙著予以问世，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学术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为笔者将在中国和日本所研究的成果加以整理而成。根据南开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术交流协定，笔者在早稻田大学进行了11个月的研究，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在此意义上，此书也可以说是两校学术交流的产物。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向早稻田大学表示谢意。同时向鼎力惠予协助的大畑笃四郎教授和真诚支持此项研究的日本各位朋友深致谢忱。

本书原以日文写作，后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决定用中文在国内出版。时值笔者健康骤逢变故，于是委托天津编译中心王原、李作民、孙元先生译，孙祥澍、孙立民先生初校，南开大学熊沛彪先生总校及修订。另外，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文君编辑为本书出版也做了大量工作，值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辛焯

1998年12月30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日外交	1
一、武昌起义与各列强的态度	1
二、日本军部、政府、外务省的对策	9
三、袁世凯出山与各列强的对策	29
四、南北议和、政体问题与日英等国的对策	43
五、日本民间人士、舆论和议会的反应	64
第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与中日外交	83
一、孙中山的外交活动与日本	83
二、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	98
三、日本关于提供武器和义军北伐的对策	111
四、汉冶萍公司借款	122
五、江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与招商局借款	137
六、南北妥协与日本	148
第三章 日本的满蒙政策及对闽浙地区的渗透	165
一、辛亥革命爆发初期的对满政策	166
二、阴谋出兵满洲	174
三、“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82
四、租借满洲的阴谋	191
五、第三次日俄密约	203

六、对闽浙地区的渗透	221
第四章 北京政府与中日外交	232
一、北京政府成立与外交承认问题	232
二、善后借款时期北京政府与列强	244
三、地方各省借款	266
四、中日贸易与三井物产	274
五、日本对俄蒙协约的对策	292
第五章 孙中山访日与中日外交	301
一、孙中山的访日要求与日本的态度	301
二、孙中山访日与孙、桂会谈	315
三、中国兴业公司	329
四、中日实业公司	341
五、孙中山对日言论的虚实	351
第六章 二次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	359
一、宋教仁被刺后日本的对策	360
二、二次革命爆发前后日本的对策	378
三、孙中山、黄兴赴日问题	393
四、孙中山、黄兴在日本的活动	405
五、兖州、汉口、南京事件交涉	419
六、承认北京政府问题	441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中日外交	455
一、日本趁火打劫与中日交涉	455
二、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活动与日、袁的对策	479
三、“二十一条”的形成及交涉过程	489
四、“二十一条”交涉时期中日与欧美列强的双重外交	516
五、袁世凯、孙中山与“二十一条”	533
第八章 洪宪帝制与中日外交	549
一、帝制运动与各方面的反应	549

二、第三次革命与护国战争	582
三、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与“张作霖工作”	593
四、山东举义与孙、黄回国	606
五、袁世凯死后日本的对策	620
附录：书评	633
民初北京政府对日外交再认识	
——《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读后	635
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评俞辛焞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643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评俞辛焞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648

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日外交

武昌起义是局部性的地方起义，故其含义不能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但由于它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所以将它视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起点。基此，本章拟探究清政府将武昌起义作为局部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并比较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武昌起义军和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等。与此同时，揭示革命爆发初期日本军部、政府、外务省的对清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考究袁世凯上台，南北关系随之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将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交涉与对英国的外交交涉进行比较；同时将日本民间人士、舆论、帝国议会的反应，和此种反应与日本政府、军部的关系，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等诸问题加以探讨。

一、武昌起义与各列强的态度

辛亥革命既是连续的革命，又是分阶段进行的革命。4月黄花岗起义到10月武昌起义前后这一时期为其第一阶段。在此时期，处于对立关系的清政府与革命派、起义军对日本有何要求？日本对此有何反应？并以此与欧美列强比较，以探讨武昌起义与日本、欧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黄花岗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前奏。

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

广州举行新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黄兴、胡汉民、赵声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以及南洋华侨代表出席了会议。该会制定了以青年革命志士 500 人和广州新军为中心，翌年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广州，然后黄兴从湖南进攻湖北，赵声经江西进击南京，汇合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势力举行北伐，打倒清政府的计划。

孙中山为了便于指挥起义，认为应利用距离广州最近的越南或日本为根据地。但法国当局在 1908 年即已将孙中山从越南驱逐出境，日本也在 1907 年 3 月对孙中山采取了促其自动离境的处置。1910 年 6 月，孙中山曾秘密在横滨上岸，但被驱逐。因此，孙中山只得于 12 月 6 日从槟榔屿出发，经由巴黎，远赴美国和加拿大筹措起义军费；黄兴则以香港为基地准备起义。随同准备工作的进展，孙中山决心在距广州的日本指挥起义，因此他请求日本友人为之斡旋。1911 年 2 月 3 日，孙中山致函宫崎滔天，请其向过去曾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上岸的陆军大臣寺内正毅进行活动，期望日本政府准其在日居留。^①此后又分别致函宫崎滔天三次，萱野长知、宗方小太郎各一次，表示切望居留日本之意。^②但是日本政府考虑与清廷之关系，未允孙中山来日居留，又一次表明不支持孙中山等的革命起义。对此孙中山指责称，英美政府皆怀疑日本有吞并中国之野心，及今乃至不容我居留日本，使予亦不得不怀疑日本的政策的确如此。^③

然而，革命派为了筹措起义所需武器，不得不依靠亚洲武器库的日本。黄兴为此派遣黎仲实等赴日购买了步枪 628 支及弹药，总金额达白银 35000 余两。^④宫崎滔天和前田九二四郎亦协助黄

① 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08 页。

② 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12、519～520、523～525 页。

③ 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12 页。

④ 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5 页。

兴之子黄一欧购进了武器。^①此等武器的购进渠道不明。这并非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起义，而是出自商业买卖关系，但客观上对起义有利。

4月27日，黄兴等举事，开始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等处，然为防卫坚固之清军所阻，以多人殉难而失败。由于殉难者葬于广州白云山麓黄花岗，故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史称此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有八人为留日学生。其所属学校分别为：日本大学（林时爽）、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方声洞和喻培伦）、庆应义塾大学（林宽民）、早稻田大学（陈与宽）、陆军士官学校（林尹民）、警监学校（石德宽）、正则英语学校（陈可钧）。^②他们之所以为革命起义献身，与在日本留学时所接受的启蒙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激扬了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革命气势，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烽火。

这一切并非出自偶然。从20世纪初起，大批爱国青年为寻求救国真理，纷纷留学日本，学到了西洋文明和革命思想，归国后组织革命团体，以学校和新军为中心展开了宣传、组织活动。在此过程中，共进会和文学社宣告成立并发展成长，肩负起领导起义的任务，巩固了以新军为中心的革命的群众基础。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多为留日学生。及至以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其美等为中心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与之汇合，加速了革命起义的爆发。通过清末留日学生的活动，可以窥见武昌起义与日本的间接关系。

但是，清末的留日学生并非均属革命派。由于中国的社会经大分化后，产生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阶层，因而留日归来的学生也分属两个营垒。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张彪，当时任驻扎于武昌的第八镇统制，由日本军部派遣的寺西中佐任其军事顾

①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

②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问，他们的立场与发动起义的革命派相对立。寺西预测“自由思想在军队中普及开来，必将形成难以镇压之势……将来或许酿成意外之变”，他10月6日向来访的张彪提议：“或断然处分首谋者，或全然弃置不用”。^①张彪随即发布戒严令，禁止士兵离营外出，进入临战状态。此为支持清朝一方的留日学生的态度。

其时在长江流域，正值反对清政府通过向外国借款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运动高涨之际，这一运动加速了起义的爆发。面对这一有利形势，共进会与文学社于9月中旬合并，组成统一的起义指挥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任参谋长，制定了具体的起义行动计划，全力进行起义准备。10月9日，设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地下指挥部发生爆炸事件，俄国警察前来搜查，起义计划泄露，起义指挥部遭到袭击。在这种紧急形势下，10日夜，第八镇第八工兵营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占领了楚望台武器库。驻扎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士兵亦起而响应。三四千名士兵猛攻湖广总督衙门，翌日黎明将其占领。起义军乘胜前进，12日占领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尽入起义军手中。张彪携带家眷于11月9日逃往长崎。^②

起义军将中国国名定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指挥部命名为中华民国政府湖北军政府，强行推举原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就任都督。湖北军政府以黎的名义发布公告，号召建设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开创中华民国新时代的起点。

武汉三镇历来为中国九省交会之要冲，华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之中枢，长江、汉水的水运和京汉铁路之接合点。作为华中物资集散地，其地位堪称“中国的芝加哥”。因此，列强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汉口，并先后设立了英国（1861年）、德国（1895年）、法国（1896年）、俄国（1896年）、日本（1898年）等五国租界，以及瑞典、比利时等11个国家的

^① 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原书房，1981年，第307页。

^② 《申报》，1911年11月14日。

领事馆，成为华中的重要国际贸易港。这里集中了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的集中，武昌起义直接与日本、欧美列强利害攸关。

清廷的统治者们企图利用汉口的上述国际关系镇压起义，逃亡汉口的湖广总督瑞澂，要求汉口的各国领事借口保护租界和侨民，出动停泊在汉口江面的各国军舰，阻止起义军渡江。^①同时对德国领事声称武昌起义为“义和团的复活”，要求德国军舰向武昌开炮。德国领事接受了这一要求，停泊于汉口的德国军舰准备炮轰武昌。^②但是，义和团事件后列强间的协定规定：凡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经列强之间一致同意方可实施。德国领事遂向领事团提出报告。在13日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上，德国领事主张视武昌起义为义和团复活，应协助清军进行镇压。日本总领事松村贞雄亦对此表示赞同。但法国领事侯耀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意见，侯耀曾经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过接触，又曾看到过湖北军政府通告，因而对革命派和起义军有所理解，强调武昌起义并非义和团之“排外暴行”，乃是以政治改革为目的的革命起义，主张避免军事干涉。^③担任领事团首席领事的俄国领事亦赞成这一主张。最后领事团作出不进行军事干涉，保持中立的决定。^④

领事团的这一决定，与起义军的事前准备和起义的对外政策有密切关系。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给中国革命领导者以深刻的教训，从而认识到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排除和阻止列强的军事干涉。所以，武昌起义指挥部在9月24日决定起义日期和行动计划时，在军政府内设立了以宋教仁为部长，居

① 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一年（1911年）8月至11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年，第652页。

② 见肖建东：《德国与辛亥革命》，吴剑杰编：《辛亥革命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③ 1916年，我国褒奖法国领事侯耀。

④ 见“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昌首义》，同编纂委员会出版，1961年，第379页。